

民国名刊简金

长河流月

◎《逸经》散文随笔选萃

南辕 选编

“动一山春色”。
国文坛，大师辈出，
化成就了一批争奇
艳的文学名刊——

《小说月报》、《语丝》、
《现代》、《文饭小品》、
《太白》、《杂文（质文）》、
《论语》、《人间世》、
《逸经》、《鲁迅风》、
《万象》、《野草》……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谨 启

本丛书所选民国时期文章,距今时间既久,又涉及作者众多。人世沧桑,我们很难与这些作者一一取得联系,故恳请书中收有其文章的原作者与本社文史编辑室联系。至为感荷。

长 河 流 月

——《逸经》散文随笔选萃

南 轅 选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60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201-03016-7

I·129 定 价:15.90元

逸經

文史半月刊

廿五年七月廿日

第十期



《逸經》封面之一

逸

經

文史半月刊

第卅一期

廿六年六月



《逸经》封面之一

序

舒 芜

文学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既慢又贵且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即使在名山胜景、邮亭驿馆的壁上题写，在盛会雅集沙龙中吟诵，影响可以扩大一点，经久一点，究竟也很有限。印刷术虽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其用于文学作品，长时期只是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慢慢送人，不用于随时写成的单篇文字。除了进学中举点翰林时的刊文之外。而自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20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以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而且，还有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种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并且这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期刊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着常在那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多少读者，知道读者大致

序

会怎样接受，欢迎不欢迎，考虑要不要适应读者，或是引导读者，或是改造读者，或是有意与读者为敌；也大致知道自己在在这上面将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为伍，考虑要不要适应他们，或是我行我素，或是有意立异，或是委而去之。有了文学期刊，所谓“文坛”的“坛”才有了实物，“坛”就是主要由期刊组成的。新文学对旧文学的迅速胜利，就表现在新文学期刊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占领了期刊就是占领了文坛。新文学运动以来，认真努力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未绝，仍自有其师承流派，也有成就颇高的；然而，他们没有什么期刊，偶有几个也势孤力薄，不成气候，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坛”，就显得溃不成军了。有了文学期刊所组成的文坛，而后才可能有职业半职业作家。每种文学期刊有一个主编或编辑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进、促退，安排、协调，组织、引导等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文学市场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他给文学史带来许多全新的东西。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晨报副刊》，没有“开心话”一栏的设立，没有孙伏园，没有孙伏园与鲁迅的关系，没有孙伏园善于笑嘻嘻地催稿，就不会有《阿Q正传》，或者不会在那个时间写出来，或者不会是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样子。《阿Q正传》如果是在没有文学期刊之前写出来的，即使能达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也不会在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危惧不安，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头上，从而对作者为谁作种种猜测，多方打听，先是到处说《阿Q正传》处处在骂他、后来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他这些戏剧效果。甚至，孙伏园如果不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阿Q正传》就会比现在长些，阿Q被枪决就会迟些。

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

新文学史，当然要研究各种别集、总集、长篇专著，但单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有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一个文学期刊，往往大致上体现一个流派、一种主张、一种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业性刊物，也仍然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倾向。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作品的“语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影响的比较和受读者重视欢迎的程度的比较。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文学流派倾向的全貌，看清一个个文学流派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仅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一个一个文学论争（也有些不纯是文学范围上论争）的全貌，看清论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看清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鲁迅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来，时常被举为鲁迅如何“尖刻”如何“不宽容”的例子。只有研究了当时的有关期刊，才看到其实是梁实秋首先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么一个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引到“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引到“到××党去领卢布”的问题，给论敌扣上一顶当时千真万确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红帽子，这才看得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称实在还是很宽厚的，这是近来逐渐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散文的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鲁迅、周作人两个高峰的创作成就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证据。要研究新文学的散文方面的历史，尤其要研究文学期刊。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别还因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无论是再现现实，还是表现自我；是针砭时弊，还是抒写性灵，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叶，所以更需要从文学期刊上来研究，才能够把每一篇散文作品放在其具体“语境”中，同一流派倾向中，不同流派倾向的竞争中理解。

新文学中的新散文，滥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不是文学期刊，后来它一分为三：后期《新青年》继承了前期的政论而外，《小说月报》继承了它的文学方面；《语丝》继承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是商业性的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来接任该刊主编，是鸳鸯蝴蝶派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沈雁冰接编后把它彻底改造为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则是新文学的一大胜利。《小说月报》以小说和文学理论为主，其所载的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是后来社会速写报告文学的先声，代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语丝》则是第一个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点是充分发扬主体性，任意而谈，批判旧的，催促新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后来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从“我思故我在”的立场，坚持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论语》、《人间世》、《逸经》、《文饭小品》等散文随笔刊物，被论者称为“闲适派”。鲁迅则从“我在故我思”的立场，坚持面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太白》、《杂文》、《鲁迅风》、《野草》等杂文小品刊物，被论者称为“战斗派”。这两个称呼未必十分贴切准确，但大致可以说，二者正好分别代表《语丝》的一面，是《语丝》的一分为二。二者曾经尖锐对立，今天从文学史的宏观上看，又未尝不可以说是合二而一，共同发扬了《语丝》所开创的光辉传统。此外还有比较中间比较兼容并蓄的《现代》和《万象》，二者不纯是散文刊物，而所载散文亦有相当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说的《新青年》之后的十种新文学期刊上的散文，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现在按期刊分别选集，较常见的名家名作，也与同一期刊上较不常见的作家

的优秀之作选在一起，这样就接近于以期刊为载体的散文发展史的“原生形态”，带露沾泥，生香活色，读起来自与读作家专集或他种选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对于爱好散文的读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来说，这是我们敢于说这套选本有他种选本所不能代替的价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序



前言

抗战前的十余年,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发展颇为重要的时期。不同风格流派、不同志趣追求的文学刊物彼消此长,竞相要在某方面一领风骚。“腾云似涌烟”,当时文坛热闹非凡之象,可以从各种期刊的盛衰演变中略见一斑。尽管办刊资金的困扰、刊物内部的人事纠纷、读者对刊物的好恶、当局的干预、时局的冲击等等,都对刊物的生存产生影响,并且不少刊物正是在上述种种因素的制约下难以维持多久,甚而仅有出一、二期即告终刊者,但是,五花八门的文学期刊仍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层出不穷。其中,有远离现实、以“昌明国粹”为旨归的复古之刊,有强调所谓“中心意识”的“民族主义文学”之刊,有“不谈国事”、专心致志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灵文学”之刊,还有关注社会、“作追随时代潮流的风帆、作暗夜中寻求光明的火炬”之刊……,可谓千奇百态,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和复杂多变性。

《逸经》也是这百舸争流的文学期刊中的一种。就该刊总体特征而言,它属于自由主义文学流派,在思想情趣上与林语堂、周作人一类淡化政治意识、提倡恬淡趣味的人所办之刊为同一类型,尽管在文字内容上偏重于文史知识的普及而不仅仅在于幽默小品闲适情调的追求。

《逸经》的筹办过程历经了一年左右时间。《逸经》社长简

又文原与林语堂、陶亢德、徐计等共同编辑《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由于诸编者与该刊的经营者在办刊方针等一些问题上常发生分歧，简又文与林语堂等便萌生了另起炉灶的想法，“必使事权统一，免再受气”，遂商定各自另办刊物。1935年9月，林语堂、陶亢德等主持的《宇宙风》文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简又文与谢兴尧等筹划创办《逸经》在得到许多文友的支持后也信心大增。而《人间世》则在编者各奔东西后于1935年12月终刊。

1936年3月5日，文史半月刊《逸经》在上海创刊。简又文任社长，自第1期至21期由谢兴尧主编，第22期至36期的主编为陆丹林。该刊为16开本，仓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由陶亢德经营的人间书屋代为发行。

社长简又文，字永真，号叔繁，笔名大华烈士。广东新会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民国六年（1917），毕业于广州岭南学堂，后入美国欧柏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获宗教教育科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北平今是学校校长、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等职。他有较强的社交和组织能力，并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因而由他来主持《逸经》这一文史杂志的出版工作可谓得心应手。当时该刊平均每期能发行约一万册，应该说是较成功的，充分说明了他的值得称道的办刊能力。

主编谢兴尧，笔名五知、老长毛、菟公、知非、知是、沈亦。四川射洪人。北京大学文史学系毕业。长于清史研究，曾投身故宫档案的整理工作，对清代民国史料均很熟悉。主编陆丹林，号自在，广东三水人。毕业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长于文学，精于鉴赏。此二人先后主编《逸经》，使该刊在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有百花俱开之象，呈现出与一般纯文学、纯史学

刊物不同的特色。

《逸经》有十几个栏目，由几位编辑分工负责：谢兴尧主持“史实”、“游记”、“书评”，其中“史实”主要为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史事的记叙与考证；“游记”为民风世象、风景名胜的描述；“书评”为对古今图书的品评。陆丹林主持“人志”、“秘闻”、“诗歌”等栏，其中“人志”为对社会名流的记叙；“秘闻”搜求稀有轶事；“诗歌”注重咏史、咏人、咏物的佳作。胡肇椿编“考古”，记录古物古迹的新发现。李应林编“纪事”，侧重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追述。明耀五编“特写”栏，谈论各种制度、组织及社会现象。简又文编“小说”、“杂俎”。陆丹林任主编后栏目有所调整，大致包括：文学、艺林、特写、诗词、纪游、小说、杂俎、史乘、考据、掌故、秘闻、人志及民族问题、今代史料、太平文献、建国史实等门类，其中有的为非固定栏目，不是期期都有。由此可见，《逸经》的内容相当宽泛，虽然终究以提倡幽默趣味为旨归，但它并不局限在谈天说地和有关草木虫鱼的雕琢上，颇注重文史学术的积累。而它的轻松的笔调、妙趣横生的内容，又使之有别于纯粹文史研究的呆板学风。

《逸经》的宗旨，诚如其命名所揭示者：“汉六经皆置博士，其出自屋壁、传于民间、不在博士所习者，皆谓之逸。”即此刊偏重于发掘正经学问家们常常忽略的领域，既搜求很有欣赏价值的美文奇文，又广集可资各界人士参考的轶闻逸事，以开人眼界、广人见识，既能消闲、复能益智。在形式上“长短不拘，语文并用，庄谐杂出，雅俗共赏”；在内容上“不尚清谈，不发空论，必求言中有物，华而且实，使能篇篇可读，期期可传”。因此，编者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逸经》之性质，是超然的及纯粹的文艺与史学的刊物，并无政治作用，亦无牟利企图，尤其是无党见、无派别，既不为个人作宣传，更不受团体所利用。”（见《〈逸经〉文史半月刊发刊启事》）

就思想倾向而言,编者们所谓“无党见、无派别”,不与政治相干,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尽管该刊在经费上全由办刊者自己承担,未受任何组织、党派的津贴,这种经济独立性使编者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在上海这样的国民党势力严格控制下的中心城市,他们不可能真正超然物外,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局的步调保持一致,否则,他们就无法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逸经》的存在。

从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正处在被人践踏被人宰割的“危急存亡之秋”。而国民党政权犹对那金戈铁马之声处之泰然,一心要与邻邦“友善”,反映在国统区的许多期刊上,便是对日寇的入侵行径轻易不敢公开表示不满,以免“友邦”抗议。《逸经》也处在这样一种深恐给当局添“麻烦”而“多少事,欲说还休”的境地。面对日寇的猖狂,《逸经》偶尔也发表一些讥讽日人的文字。但言辞之委婉总让人有不痛不痒之感,甚至至于不便直呼其国名军队名,而以“×军”、“某国”乃至“友邦”称之,可见其受束缚之紧。尽管如此,它也多少表明了编者们的敌视日人的态度。像第7期上的《神秘火柴》、第35期“东南风”栏中的《其人像鬼》,尤其“七·七”事变爆发后在第36期上刊发的《前线简闻》等,均表现出在民族存亡之秋,以闲适为旨归的《逸经》终究不忍一味闲适下去,而要作些呐喊——至少也得敲敲边鼓,而非麻木不仁地作壁上观。

由于与现实相关,《逸经》中有的文章便回避不了“党见”、“派别”问题。所刊载的一些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文章,固然有保存当代史料的价值,而其拥蒋反共的倾向表明,“心存魏阙”的编者终究是要为国民党当局“分忧”、站在当局的立场去评说时事。因此,这类文章的登载,又往往是为了提供“历史教训”:引导人们在国民党的旗号下俯首听命。《红

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载第33、34期),较客观、详细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为当时读者了解不可战胜的红军的伟大壮举无疑起了积极作用;然而编者却在提要中称:“‘红军’颠沛流离的西窜经过”可以“使人们知道要是离开中华民国而独树一帜,无论怎样的根深蒂固,终必有覆亡的一天”。编者确信,中国的“共产党”和“红军”“已停止军事的活动和政治的宣传”,因而也就一蹶不振、成为了“历史的名词”。受这种眼光的局限,《逸经》便每每以一种歪曲的论调来评说中国革命。《赤匪陷漳的经过》(第2、4期)、《赤匪首领李德博古逆迹记》(第6期)、《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第11期)、《宁都暴动与所谓季黄反革命案》(第36期),以及有关瞿秋白的几篇文章(第25~28、34期)等,便都不同程度地带着对中国革命的偏见。当然,这种状况也与国民党的言论控制有关,我们从个别文章字里行间所透露的对共产党人的赏识、同情之意,也不难感受到作者、编者不得不用所谓“党国”惯用的腔调说话的无奈。

毕竟这是一个为了使人“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的刊物,它不会过于“哀民生之多艰”,也不会对时代风云中的“跨征鞍,横战槊”倾注过多的注意力。上述体现“入世”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作品,所占比例并不多,刊中绝大多数文章仍属于“希冀得到人们‘美的欣赏’”之类(简又文:《〈逸经〉的故事》,以下不出处者同此)。虽然编者自谦“不想夸诞自大而假冒着‘提倡风雅’或‘振兴文化’的佳名”,但其刻意追求“用轻松有趣的笔调”写出让人“津津有味读之不厌”的文章来的情调,表明他们对闲情逸致的喜好;虽然他们有“联合许多脾气不同、见解不同、宗旨不同、嗜好不同的文人来办这《逸经》”的表示,但这种“不同”主要是对“闲适”叫好的人之间在文风、专业、爱好上有别,而非根本的思想志趣的不同。我们可以在《逸经》上看到当时提倡幽默甚力的人物如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郁达夫、

简又文、陆丹林、老舍……等的清雅小品，也可以看到刘成禺、冯自由、谢兴尧、徐彬彬、徐一士……等的掌故趣谈，徐彦、胡怀琛、幽谷……等的文史杂考，及谢冰莹、许钦文、钱歌川……等的精彩散文和小说，诸如此类，多属供人消闲博闻的读物。人们决不能指望从这本刊物中深深感受时代的脉搏和现实的震撼。

当抗日救亡成为每个中国人所应肩负起的民族重任时，却仍有人在大谈幽默闲适，“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庸”（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自然是很不合潮流而为许多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们所指斥。《逸经》编者有鉴于此，在追求消闲遣兴趣味之余，也颇注重历史的考究与研究，欲通过传播民族的历史及表露社会的发展历程，培养起人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倘使人人深明本国本族已前或现在之光荣或耻辱，则其忠愤爱国之心靡不勃然而生油然而长者矣”。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了解过去正是为了面对未来，只是由于它所涉及的历史主要是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期的轶闻趣事，有关民族的辉煌、历史的教训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因而要像该刊所说以此“提起人民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终究是有距离的，尤其与抗日救亡难以同步。

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一笔抹杀《逸经》的价值。与林语堂用“空灵细腻”之笔记人叙事的主张相类，《逸经》的编者也深信“幽默也可于茶余酒后之外别有启迪灵知润饰文章助长思想之用途”（林语堂：《与又文先生论〈逸经〉》）。无论如何，雅致轻松的文字决不可能发挥激昂慷慨的笔锋所能鼓起世人冲锋陷阵的勇气的那般作用，但只要不属无病呻吟的颓废之作，它可以通过陶冶人的性情间接地促使人满怀对国家、民族和人生的希望去面对未来，则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何况文学界不能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只要能发挥启人心智、催人奋进

的社会功能,它就有存在的价值。以政治意识排斥审美意识,或只重审美意识而忽略政治意识,都是片面的、偏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当时战斗的时代精神不甚协调的《逸经》,从艺术鉴赏角度看,还是有其可称道的地方。

在“文学佳作、趣味文章”以外,《逸经》还极为重视披露“独特珍贵、世不经见的资料”,从而“对于学术界文艺界不无相当的贡献”(简又文:《〈逸经〉之已往和将来》)。尤其是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诸如《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日》、《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资政新篇》、《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江详记》、《庚申常州城守日记》等),有关援越抗法战争的记述(如《援越抗法光荣史》),有关辛亥革命的各种史料(如《追怀总理述略》、《关于徐锡麟烈士》、《同盟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总理伦敦蒙难之另一史料》等),对清史的考据(如《咸道时代北方的黄崖教》、《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王闿运与湘军志》、《从董鄂妃谈到张宸》、《年羹尧奏折之朱批及其遗作》等),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如《关于畚民》、《客族源流考》、《汉满蒙回藏五族名称之研究》等),对古典文学中某些专题的研究(如《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东京汴梁考证》、《〈品花宝鉴〉考证》、《关于〈西厢记〉的作者》、《东坡的错误和取巧》、《杜甫诗中之宗教》等),还有有关当时重要人物事件的记录(如《西安事变中之秘闻》、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前文已提到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之类),如此等等,均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这是《逸经》有别于一般文学刊物的地方。

1937年8月,编者们在出完《逸经》第36期后,原准备出版第37期秋季特大号的。然而,此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日寇又在上海挑起了战端,《逸经》的编者们的再也不能继续原来的出刊方式,便以新的方式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之中。他们不

△前

言

再单独刊行《逸经》，而以之与《宇宙风》半月刊、《西风》月刊合并，从8月30日开始出版《宇宙风·逸经·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此刊16开本，每10天一期，内容几乎都与抗战宣传有关。文风上仍保持了那三个刊物原有的庄谐杂出特点，但草木虫鱼之类闲适文章不复刊载。战火烽烟使每个有民族心的中国人拿起了投枪，根本无心沉醉于风花雪月的吟咏了。

这个联合旬刊共出7期，至同年10月30日终刊。此后《逸经》未再复刊，结束了它曾有过的还算辉煌的历程。

本书侧重编选短小的散文随笔、轶闻掌故，因而从所选文章中可看出的是《逸经》闲适逸致的一面，却难以体现《逸经》的总体风貌。一个强调“中西并集，古今兼收”、“华而且实”、“庄谐杂出”的文史刊物，是决不只局限在异趣奇文一点上的。然而即使从选编的这些文章中，我们仍不难感受到《逸经》内容的丰富多彩性、风格的雅俗共赏性。其中多少逝去的充满神奇的往事，多少令人瞩目的社会名流的行迹，多少洋溢着空灵逸气并感人至深的情趣，透露出《逸经》的文章之美妙、清幽，及意蕴悠长、成为历史见证的时代印痕。宋人陈与义《临江仙》词中有“长沟流月去无声”之句，意谓夜深水流，投射在长河中的月影仿佛也随之无声流淌。我想，河水永不停息地带走时光，而昔日的朗朗清月，至今仍映在水中。以此之故，本书书名曰：《长河流月》。

编 者

1997年6月